



王德领 著

混血的生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76—1985）
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混血的生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76—1985）
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

王德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血的生长/王德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04-9765-3

I. ①混… II. ①王… III. ①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1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033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得知王德领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与作者一样感到高兴。德领是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带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第一届硕士生是韩国学生梁元喆。德领同届的师姐是汪海泳。硕士毕业后，德领进入久负盛名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从普通编辑做到一个部门负责人，已有十多年。在此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重新回校攻读博士学位。一方面要承担繁重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辛苦读书，撰写博士论文，其中的艰难，唯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不过，我也分享了他写作准备和思考的一部分过程。德领在研读大量材料和构思的期间，有几次搭乘我的车，每次都有一个多小时。我开车回原来居住的北京西三旗附近的住宅，他则在西三旗桥下下车，再转车回回龙观的家。一路上，我们多次讨论论文的有关问题，从选题到筛选材料，从论文框架到具体章节的取舍，都在谈话中有所涉及。我们的讨论，是在德领自己的初步思路展开的，有些问题他在写作中有所吸收，有些则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

我们知道，作为新时期文学之开端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它的生成来自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纠结，但其中，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部分。过去，人们的研究对此问题虽然已略有涉及，但作为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予以揭示和深入

讨论的，恐怕还只有王德领的这部个人著作。然而，揭开这一历史路径，重新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先锋文学之兴起的复杂原因，需要研究者花费巨大精力去搜求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研究，在进一步筛选、利用和整理的过程中，对问题进行一步步地推理。与此同时，“作家创作”与“翻译”的关系，是论文写作的重中之重，也需要作者选取几位重要作家，根据不同问题来设定章节，然后分别论述。然而，由于作家个人背景、文学修养和写作风格的差异，他们对翻译文学的接受、消化和再创新，以及取得的效果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就要细心地作出不同判断，通过比较性研究的方式，来达到撰写论文的目标。另外，还须了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神话模式”、“家族模式”，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相类似的文学现象，例如巴金《家》里的文学书写，它们之间有无承传关系，是在什么意义上承传和变异的，在具体作家创作过程中大概也有不同表现。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都在德领对论文的准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而且在我看来，由于博士论文的篇幅所限，如果试图穷尽这些问题，一一都找到满意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篇博士论文所花费的巨大精力，它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我想读者当能在其中找到例证，无须我在这里多说。

德领写硕士论文时，他文字的干净、平实，叙述问题的清晰自然，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文字风格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一一贯穿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之中。鉴于他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主要是与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打交道，对当代文学有独到的观察，对作家创作本身，也有许多切身体会。在我看来，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博士论文，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和文字准备，所以德领把自己的本职

工作与博士论文写作融为一体。这对保证他论文的顺利完成，并取得良好的学术效果，显然是事半功倍的。对德领的博士论文，我还有许多感受试图抒发，不过，作为他的导师，我意识到也应该有一点点自知之明，在介绍这篇博士论文的特色之外，应持一种更为客观中性的立场。因为读者自会明辨。

程光炜

2010年岁末于澳门大学

目 录

导论·····	(1)
一 论题的由来以及研究的意义·····	(1)
二 对几个概念的限定·····	(9)
 第一章 80 年代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非理性主义	
哲学背景 ·····	(15)
第一节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想根源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界定 ·····	(15)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译介与接受 ·····	(20)
一 50—70 年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译介与接受 ·····	(20)
二 80 年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译介与接受热潮 ·····	(26)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哲学热与 80 年代思想场域 ·····	(36)
 第二章 中国文学语境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 ·····	(45)
第一节 50—70 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 ·····	(46)
一 文学新秩序中西方现代派的位置 ·····	(46)

二	反面教材:十七年期间对西方现代派的翻译和评论	(55)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现代派的激烈排斥	(59)
第二节	1976—1989 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	(65)
一	1976—1978 年对禁区艰难的突破	(65)
二	1979—1989 年对西方现代派的译介	(74)
三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现代派译介的特征	(80)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与现代派文学的接受	(86)
第三章	西方现代派文学接受中的论争	(96)
第一节	从论争文章统计看论争呈现的几个特点	(97)
第二节	如何看待这个“陌生而混乱的世界”: 论争历程的简要回顾	(113)
第三节	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发展 道路的论争	(119)
第四节	论争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137)
第四章	1976—1985 年中国文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 接受	(147)
第一节	现代派接受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148)
一	当前创作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148)
二	对现代派文学形式的“剥离”	(154)
三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与小说 文体热	(162)
第二节	对荒诞存在的反讽式表达	(172)
一	存在主义觅踪	(173)

二 “虚无连着虚无”抑或“本体的荒诞”.....	(188)
三 影响的焦虑:互文性写作中的文化身份的 确认.....	(196)
第三节 命名的困惑:80年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203)
余论.....	(214)
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36)
文学研究与生命的关联(附记).....	(240)

导 论

当代文学中的外国文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与其他文学创作方法相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迫切地感受到“身份”的焦虑，一直在寻求外国文学资源来建构自身。从苏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都曾经作为可资借鉴的“遗产”，对它起过重要的塑造作用。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则对它成功地进行了解构，使之趋于瓦解，因此，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重塑”作用，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在这种解构的背后，其实是思想知识类型已经发生变化的结果。本书试图从文学思潮史的角度，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放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文化场域中，结合中国文学语境，分析这种变化的依据与内在的逻辑运作过程。

一 论题的由来以及研究的意义

把外国文学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研究不仅存在着语言隔膜，而且还带有冒险性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文学的语境里，我们所面对的外

国文学，实际上是翻译文学，而非外国文学原作。而汉语和其他文字，尤其是字母文字，有着天壤之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别塔是难以逾越的。但是，漫长的世界文化交流史早已证明，翻译是在异质文化中为保存原文而采取的一种必需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包括字里行间的潜在译文”^①，两种不同的语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正如本雅明所说，“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因为各种语言绝不是相互陌生的，而是先验地、除了所有历史关系之外而在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上相互关联的”，这些异质的语言间存在着“内在的亲缘性”和“特殊的趋同性”。^② 在《圣经》中，人类诞生后，“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人们要修建一座凝聚普天下民众的城和通天的塔，这引起了上帝耶和华的恐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耶和华来到了人间，“变乱（confused）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③，天下人彼此言语不通，通天塔自然造不成了，上帝以种类繁多的语言取代了“元语言”，起到了“分散”天下人的凝聚力的目的，树立了自己的威权。但是，上帝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得逞，正是由于各种语言之间的这种可译性，借助于翻译，“通天塔”始终在修建，虽然也许永远不会完成，但是始终在修建之中。

虽然存在着可译性，译文与原作显然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内容和语言在原文中构成了一种统一性，如同一个

① [德]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4页。

水果与其外皮，而译文的语言则像宽松的皇袍围包着内容。因为它指代一种比自身语言更尊贵的语言，因而不适合内容，给人一种压抑和陌生的感觉。这种断裂阻止了翻译，同时使其流于肤浅”。^① 并且，“本质的果核在翻译中是不可译的，它不是内容，而是内容与语言之间、果实与果皮之间的紧密依附”^②。内容与语言的关系是天然的，译文的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则是“像宽松的皇袍围包着内容”。尽管译文不可能完全再现原文，但是译文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③。“翻译的确是原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原文在扩大自身的过程中完成自身。”^④ “当译作和原文碎片状结合时，二者不管多么不同，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在生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更大的语言，也改变了它们自身。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译者的母语也改变了。”^⑤

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由于翻译的介入，发生变化的何止民族语言，还有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由于异域的文学大量涌入，作家通过对译介过来的外国文学的模仿、吸收、创造性转化，使民族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民族文学的发展需要相互关联，需要相互作用和相互学习。软弱静止的民族文学可以

① [德]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② [法] 雅克·德里达：《巴别塔》，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 页。

③ [德]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④ [法] 雅克·德里达：《巴别塔》，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 页。

⑤ 同上书，第 31 页。

从生机勃勃的民族文学那里获得一剂能量而焕发青春。翻译为创造强大的民族语言和文学作出了贡献，这一思想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已经流传广远，成为许多翻译实践的隐含理由。”^①早在 19 世纪初，热尔曼娜·德·斯塔耳就大力鼓吹通过翻译来改造民族文学：“人所能为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文学也必须经常通过对峙、对话和交流来更新自身。德·斯塔耳严厉地批判了法语的文化优越感。他想通过引入像德国文化等外来文化的最明显的因素来打破他们的自足性。浪漫主义，尤其是北部的感伤作品，英国和德国的浪漫派，将是更新南部即法国和意大利古典文学的力量源泉。而更新的手段就是翻译……翻译是文学和政治变革的动力，她认为意大利人应该把翻译作为更新其已经硬化的古典传统的手段”。^②民族文学对异域文学的接受，一直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毋庸置疑的是，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塑造作用更为巨大。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晚清文学的确是属于“软弱静止的民族文学”。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无论是对旧文学的指责，还是对新文学的设计，背后大都有一个潜在的标准，即西洋文学的标准。以五四文学革命的健将胡适为例，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虽然谈的是中国文学的改革，“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下断语的依据却是西洋文学标准：“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

① 雪莉·西蒙：《热尔曼娜·德·斯塔耳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文化掇客》，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3 页。

② 同上书，第 276 页。

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胡适在该文中盛赞“但丁、路得之伟业”，因为他们摒弃了陈陈相因的正统文字，用一种当时被称为俚语的文字进行创作，“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认为创造新文学“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这是因为，他断定“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Bacon）和法国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林（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2500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更以（西洋）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①胡适的这个对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判断，一抑一扬，倾向何其鲜明。现在看来，胡适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对中国文学的判断很难说得上是客观公允，但是他对于翻译西洋名著的呼吁，借助于翻译从而催生中国新文学的诞生的设想，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

^①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在 20 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① 一次是在五四时期, 外国文学的“介入”, 直接催生了中国新文学。五四时期, 围绕着“科学”与“民主”, 启蒙与救亡, 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译介的重点, 文学成为思想解放、探讨社会问题、谋求民族强大的利器, 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无论是新文学的体裁划分, 诸如自由体诗歌、小说、散文、话剧, 还是新文学对“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强调, 乃至贯穿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许多文学潮流, 如“象征诗派”、“新潮小说”、“普罗文学”、“新感觉派”、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 等等, 莫不与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国文学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 操纵着中国诞生不久的新文学, 使中国文学告别了漫长的封闭、自足状态, 向着“世界文学”的面貌靠拢, 加入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进程。

另一次译介高潮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时期, 除了重印、新译古典文学名著之外, 还重点翻译了西方 20 世纪现、当代文学作品, 其中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由于现代派文学被排斥了将近 30 年, 国内文学界视这些作品简直是天外来客, 称之为“新、奇、怪”, 不啻引发了一场文学地震, 引起了激烈论争。论争由外国文学界迅速扩展到创作界。中国作家从形式入手, 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模仿、改写、创造性转化, 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文学的“高大全”叙述模式, 打破了定为一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① 有学者认为, 五四以来, 外国文学的译介的高潮出现了三次, 一次是五四时期, 一次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再一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认为, 就外国文学对中国民族文学重新塑造的深度、广度, 乃至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范式影响而论, 五四时期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时期。

义的创作模式，使中国文学的创作格局出现了多样化，体现了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联系，变得“世界性”了。外国文学的译介，尤其是对其中的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是推动中国文学发生巨变的强大动力。五四时期胡适所谓的外国文学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建设所起的“模范”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得到了确证。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曾经说过：“文学史始终是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 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复兴，对其提供发生学的解释是很有必要的。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存在着可供解释的多重可能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解放的角度，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入手，从社会环境、文学政策的逐步开放，以及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来解释文学的这种变化，外国文学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当代文学中的外国文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直存在着身份的“焦虑”，迫不及待地在外国文学中寻求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建构自己，文学越是政治化，这种建构意识越是强烈，由此引发数次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新评价，以辨别哪些资源可以进入被借鉴之列。西方现代派文学，由于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思想基础、政治意图等方面成为对立的两极，因而一直受到激烈排斥。20世纪80年代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尽力弱化之后，被遮蔽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得到彰显，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彰显和影响在中国语境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图景。因为任何一种文学思潮进入中国，都有

① [美]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什么是文学史？》，载郭宏安等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和现实缘由，在它的背后，往往是一种知识类型发生了位移，由此改写了原有的知识谱系，何况西方现代派这样一种隶属于非理性主义范畴的文学思潮，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看来，本身带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现代派以及所依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思想场域时，不可避免地与国内的思想话语产生摩擦和交锋，在思想领域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论争，在文学领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相互纠缠在一起，其间的复杂情形，恐怕不是一般的平行研究或者影响研究所能概括的。

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目前多见微观研究的文章，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的文章尚不多见。近年流行的是对中国与外国作家作品间对应式的平行研究，如《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罗璠著）；或者是某一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论文方面，如《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小说》（陈黎明）、《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滕威）等，专著方面，如《“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张国庆著）、《萨特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存在探询》（吴格非著）、《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傅晓微著）、《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曾利君著）、《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小说》（陈黎明著）等。从思潮史进行宏观的研究的论文有一些，如《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陈思和）、《1978—1982：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进》（陈思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程光炜）等，公开出版的专著则寥寥无几，比较有分量的主要有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一书。《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